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瑞典东方学译丛

# 新疆考古记

[瑞典] 贝格曼 著

王安洪 译



西域探险考察记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新疆考古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瑞典东方学译丛

# 新疆考古记

[瑞典] 贝格曼 著  
王安洪 译

# “小河”之谜与新疆考古探险

(代 序)

杨 镰

1934年。苦寂无花的初夏。

一支精疲力竭、疑虑重重的探险队，在库姆河<sup>①</sup>刚刚复苏的岸边扎下了营地。谁都知道，这个时候绝不是在新疆——哪怕是罗布荒原这地角天涯——作科学考察的合适时机。那时，塔里木地区战火方殷，由于苏联红军已经越过国境，加入到盛世才一边，不甘心前功尽弃的马仲英虽败局已定，但南疆的局势更加复杂难测。好在罗布荒原早就不再是逐鹿争雄的焦点。那时，没有人在乎这探险队在罗布荒原折腾些什么——除了探险队自己。

不错，这探险队的目标简单又明确：寻找据说就隐藏在库姆河流域的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这古墓葬后来又叫作“小河遗址”或“奥尔得克的古墓群”（即“5号墓地”）。有人曾这样认为，楼兰探险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域探险史）最有名的遗址，是楼兰古城；最重要的成就，是尼雅楼兰佉卢文文献的发现；而至今仍然谜题难明的神秘古迹，就是这个“小河”5号墓地。

---

<sup>①</sup> 库姆河(沙河)和库鲁克河(干河)都是孔雀河的下流支流，但在有些时候，塔里木河的河水也会“借道”于其中。

那么,这个一意孤行的探险队是否找到了“小河”的遗址?在“小河”,他们到底又发现了些什么呢?

—

与“小河”有关的背景,只要读过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丝绸之路》或《马仲英逃亡记》,就一清二楚了。1928年2月,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途经吐鲁番时,斯文·赫定意外获悉,由于塔里木河再次改道,他在世纪之初的预言:罗布泊将回到北方的洼地,已在1921年成为现实。从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重返罗布荒原,看看那个“复活”的西域巨泽。1934年3月,快被战争的磨盘碾成齑粉的赫定一行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去罗布荒原作探险考察的机会。

孔雀河—库姆河的新河道的一次处女航,使赫定重游故地的消息很快传遍罗布人的村落。参与过1900—1901年罗布泊探险的罗布人,纷纷主动赶来重归旗下,其中就有两位西域探险史名人:阿布都热依木和奥尔得克。正是当年罗布人中最棒的“猎驼人”阿布都热依木,把赫定领到了隐秘的阿提米西布拉克——“60处泉水”。而奥尔得克在发现楼兰古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早就尽人皆知。如今健在的老罗布人,都知道奥尔得克其人。据我作的调查,他原来居住在喀拉库顺旁的老阿不旦,后迁居于英苏,一度居住在卡拉的亲属家中。

与旧主重逢时,奥尔得克已是72岁的老人。罗布人是个“老龄化”的社会,72岁只能算是“中年”。这次赫定并不是一个人来罗布泊探险的,与他同行的,还有几个中国和瑞典学者。其中的沃尔克·贝格曼是自1927年就参加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赫定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勘测公路路线,在罗布泊地区的与之相关的考古工作,由贝格曼负责,奥尔得克自然就成为贝格曼

最倚重的顾问和向导。

在赫定离去的 33 年间，奥尔得克常常沉潜在探险的氛围里。在谈到自己这 33 年间的生活时，奥尔得克告诉赫定，15—20 年前，他在雅丹布拉克和库姆河以南的荒漠，发现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那是一处外人谁也不知道的古迹。赫定立即就判断出，的确，不论第一个在罗布荒原发现墓葬的美国人亨廷顿也好，几乎把这一带踏遍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好，运气之佳让人难以置信的日本和尚橘瑞超也好，哪怕自己和西北科学考查团旗下的其他学者也好，在库姆河以南的那个位置上，此前从来也没有谁发现过什么。当然，仅凭这一点，奥尔得克的话就不无可疑之处。但出于对罗布人诚实品质的深知，赫定立即决定，把寻找这个“奥尔得克的古墓群”的任务，交给了考古学家贝格曼实施。

在布满雅丹、沙丘和红柳包的库姆河以南的荒漠，第一次寻找失败了。这不足为奇。由于 1921 年塔里木河改道这个明显的理由，重新恢复活力的库姆河两岸的景观有了极大的改变。库姆河的含义是沙河，在奥尔得克发现那个有古墓的山丘时，它在雅丹布拉克以下滴水全无，但如今却是名不副实了，不但河床里浊流奔涌，两岸也已开始滋生出新的植被。

在两个月间的一次次寻找都一无所获后，几乎包括奥尔得克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失望了。一半是为了自责，一半是感到茫然，奥尔得克就像《天方夜谭》里的那个一再拖延死刑的倒霉王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讲着“故事”：那个墓地已经被十余年间新形成的河湖水域淹没了——这当然不可能，那个古迹不是在一个山包上吗？再说现在的水域是时隔 1500 年的“回归”，也不能想象 1500 年以前的人会把陵墓建在水里；那是“伊比利斯”（魔鬼）出没的地方，超人的力量使他无法领外人抵达这个魔域——这也算是一个理由；某次暴烈的黑风暴已将整个古墓重新埋葬……这时，贝格曼才对赫定为探险家所作的界说：除了种种稟赋，还得具有天使般的

耐心,有了切身的体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贝格曼终于断定“奥尔得克的古墓群”的确是存在的。这时,另一个瑞典籍的考察队员乔格·生瑞恒对这次探险得以进行到底,起了关键的作用:生瑞恒是瑞典来华的传教士的后裔,生在内蒙古,长在内蒙古,从1927年一开始就参加了西北科学考查团。他不一定有别的特长,但耐心却可以与天使媲美。经过他的调整,并借助其他的罗布人的帮助,考古探险队于1934年5月30日离开设在雅丹布拉克以西10公里的库姆河左岸的前进营地,向着这诱人的古迹作最后一次冲刺。

沿库姆河南行不久,就遇到了一条新的支流。可以肯定,它的这一段历史相当短暂——也许不足10年,即便罗布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当时他们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下一步就沿这南南东走向的库姆河支流前行。他们临时随意把这条无名河叫作“小河”——想不到此后“小河”竟成了罗布泊探险史的关键词。

“小河”只有20米宽,水流迟滞。在它与库姆河分流后的一段流程,壅积出一串为新萌发的芦苇和红柳环绕的小湖沼。这肯定是一条刚刚复活的古河,在它的两岸没有植被:没有像河堤似的胡杨林带,没有稀疏的芦苇草滩。沿“小河”南行了65公里,仍然一无所获。只是河岸出现了芦苇丛和牧人,这表明塔里木河的主河道就在南方不远的地方了。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次又是一场徒劳。

探险队像往常一样,在小河边扎下了营地。这一带的原野开阔、平整,覆盖着积沙,他们几乎就找不到一处坚实无沙的可以扎帐篷的空地。几个1—2米高的新月形沙丘和红柳沙包,使营地附近的景色更加单调。沙包上的红柳还活着,以仅有的生机向死寂的环境做着抗争。河岸以东3—4公里,一座浑圆的小山包兀立在平坦的沙漠之上,就像古老的路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远远地看去,在这山包(或沙丘)的顶部似乎有一片密密的死胡杨,树木直立

在那里，高达 4—5 米，而且株距极其近——活着的胡杨，株距 10 米就很近了，但这山顶的“死胡杨”近得几乎一株挨一株，近得就像靠互相支撑着才没有倒地一般。

开始，谁也没把四周的景物放在心上，只是默默地安置新的营地。最初只是奥尔得克的感觉有些异样。他就像走进了梦境，迷迷糊糊地张望着，谛听着。然后，他一个人久久地凝视着那个浑圆的小山包，一言不发。突然，奥尔得克直指那个小山包，大声说：“那……就是它！”大家全愣了，一时没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都面向小山包而立。

于是，“小河遗址”——“奥尔得克的古墓群”与历尽艰难的探险考古队，就这样对视在夕阳的余晖之中……

## 二

迄今为止，“小河”古墓在西域探险史上仍然是独特的、唯一的。不用走得太近，贝格曼就看出，那密密麻麻的“枯立木”其实是一根根用人工竖立在山丘上的木柱，再近些还能得知，那木柱是经过细木匠精心加工制作的纪念物。这个山丘只有 10×16 米的方圆，可上面竟然直立着几百根巨木，高的一组平均高出地面 4.25 米，直径 0.25 米，每根有 7—11 个侧面。木头被强风劈裂，被烈日晒开了花，但不管怎么说，它们仍然苦苦支撑着，肃穆、自尊地分立在陵墓的顶部，就像死者的血亲伫立在一个庄严的灵堂，死死地等候着迟到了数千年之久的吊唁者，虽然褪尽鲜红的颜色，仍然不愿俯下它们伟岸的身躯。

在山丘上，时时会绊到饱经岁月风霜的人骨，环顾四周，随处可见骷髅、被无端支解了的木乃伊以及厚毛织物的碎片。那铺了一地的巨大木板呈现出一种优美的曲线，连有经验的贝格曼也猜不透它的具体用途究竟是什么。而墓地的散了板的和完整的棺木



竟有 120 具以上。

在奥尔得克之后，这个“小河古墓”已经被“猎宝人”侵扰了两次。重要的——比方金银珠宝和青铜器——随葬品，早已荡然无存，连那种特有的厚毛织斗篷，也被人们拿走改制成了马的鞍垫子。在奥尔得克第一次无意中踏上山头时，山顶上还有一座完好的房屋，墙壁由木板构成，并涂上了红色颜料，屋顶在木板之上还包着牛皮。屋内堆满牛的骨骸和皮张。这些都在贝格曼到来之前被毁坏了。他见到的唯一一个没被扰动的棺木，也由生牛皮包得紧紧的，尘沙一点都没有钻得进去<sup>①</sup>。在山顶——贝格曼把它命名为“5 号墓地”——还保存有一道围栏，他认为那就是划分死者身份或等级的界限。没有被猎宝人看上的随葬品，最重要的也许是那几具木雕人像了。那人像真人般大小，有男有女，虽然彩绘早已剥落，但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奥秘要靠它们来“解答”。

1935 年，为《斯文·赫定七十诞辰纪念文集》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罗布沙漠新发现的墓葬》里，作者贝格曼忠实地记下了自己面对“小河”遗址的感受：

一些木乃伊有黑色的长发和令人难以置信地保存完好的脸。……一具女性木乃伊面部那神圣端庄的表情永远无法令人忘怀！她有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面冠以一顶具有红色帽带的黄色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似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勾鼻、微张的薄嘴唇与微露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微笑。这位“神秘微笑的公主”已经傲视沙暴多少个春秋，聆听过多少次这“死亡殿堂”中回荡的风啸声！而

---

<sup>①</sup> 这使人不禁联想起一则遗闻：清代某王府保证银元宝不丢失的绝招是，藏银时，先杀一条牛，用鲜活的生牛皮把银子包紧，等牛皮干透，就硬得赛过刀枪不入的盾牌，谁也不可能私下取走元宝了。

又是在什么时候，她面对明亮、燃烧的太阳，永远地合上了双眼？正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我才来到此地探险。

此后，在1939年出版的《新疆考古记》一书，“小河墓地”成了全书的核心和精华。可以说，如果没有发现这“奥尔得克的古墓群”，贝格曼和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探险就不免会失去几分光彩。在撰写这部西域考古探险著作时，贝格曼仍然沉浸在“小河”的独特氛围里。他这样写道：

发现如此众多的古老墓地，更进一步增强了现实的罗布荒原的凄凉与孤寂。那些保存得最好的木乃伊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像是熟睡而不是死亡，几具经历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奇异感觉的尸体，似乎自身就在欣赏着大自然保持他们两千年如生的奇迹。

为使死者避开潮湿与野兽，三角洲地区的高迈塞被人们选作坟场，两千年过去了，迈塞的外貌依旧。在那里，楼兰人沉浸在他们最后的睡眠中，一切都忠实地汇入死亡。亲属为他们准备了阴间的给养和维持以往生活的一切象征性物品。数不尽的风暴在他们的头顶呼号，在宁静的夜幕下，永恒的星河就高高悬挂于头顶，每一个夏季，火一样燃烧的太阳都会照射在他们的躯体之上。他们如此幸运地得以长时间拥有着一个和平的安息地，直到某一天，有陌生人来到这里，才搅扰了他们的不醒的长眠——就为了发现一些未知的东西，为了揭开在这块孤寂的中亚大地上保持了如此长久时间而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的隐秘。

### 三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在新疆的工作，羅布泊是重點之一。而其團員所著的考古學著作，中國團員黃文弼的《羅布淖爾考古記》以土垠遺址的發現為高潮，瑞典團員貝格曼的《新疆考古記》則以“小河5號墓地”為核心。而土垠在黃文弼之後，已多次有後繼者前往探訪；可是這個“小河墓地”自貝格曼離去後，再也沒有人能夠抵達，成了名副其實的“只在荒漠中，沙深不知處”的神秘之域；《新疆考古記》中有關“小河遺址”的內容之所以重要，也因為它竟成了“絕唱”。

關於羅布泊—樓蘭的古代文明，貝格曼有許多非常精辟的見解和十分獨到的討論。比如，他曾把樓蘭的墓地分成3組，曾推論樓蘭的墓葬有屬於“二次遷葬”的情況——這些對弄清羅布泊地區古代文明的底蘊，都頗有新意。而他對“小河遺址”的考察和研究，也體現出嚴謹、縝密的特点。他提出的“小河遺址”的絕對年代要早於張騫“凿空”，開通西行古道；“小河”地區的古居民分屬兩個不同的民族（或人種）等等，就都是相當關鍵的、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說“小河遺址”是新疆考古探險史重點中的重點，謎中之謎，是因為從“小河”出現在探險家視野里到它突然消失，都帶有太多的偶然性；而它為樓蘭文明史（甚至整個西域文明史）留下的難題則是相當關鍵，相當特殊，進而可以說是令人難以索解的。

據奧爾得克說，他是在1914—1919年間無意中發現了小河古墓的，而這個時間是根據他在1934年的回憶推斷出的。在羅布人當中，時間總是有一定的伸縮性，所以這只是個大致的期限。通過研究羅布泊地區在此之前的林林總總的出土文物，貝格曼發現，日

本释子橘瑞超得自该地区的一些古物无疑应该是出自小河的。而据橘氏自述,他的一些收藏品是在卡尔克里克(即今若羌)向当地人购买的,最重要的是购自县令。橘氏在1908—1911年间曾数次路经卡尔克里克,最后一次(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11年的年底。而据奥尔得克和其他有关的罗布人回忆,在奥尔得克发现了“小河古墓”后,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的“按班”(即县令)曾两次以派劳役的方式,命罗布人去“小河”猎宝。这不可能是巧合。这样,可以推断,“小河”应该是在1910—1911年间发现的。有关罗布人发现了新的遗址的消息,曾引起斯坦因的焦虑。《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 1928)的一个注释(787页)里,斯坦因这样说:

1914年1月,我在卡尔克里克得到的一个不大确实的消息称,1906年我第一次访问那里后,罗布猎人在靠近塔里木河下游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处遗址,它的名字也叫麦得克沙尔。据对自该地带回并卖给橘瑞超先生的物品的描述分析,似乎那里还残存有房屋废墟。因此我极遗憾在进入罗布沙漠之前没有时间亲自去这片遗址作一番搜寻。

由于在贝格曼和考古队到来前的20多年间,曾多次遭到猎宝人的侵扰,贝格曼见到的“小河古墓”早就不是“原生”状态了。除了1934年夏的文物是经过著录登记的<sup>①</sup>,到底有多少流散在民间又被收购的文物,实际上是出自“小河”,是永远也弄不清了。这就为它增添了几分不可知感。而1934年以后,再没有考古探险家能

---

<sup>①</sup> 这批文物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借到了瑞典作专题研究。50年代初,在瑞典王子访华时,将它们归还给中国,今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中的一部分已公开展出。

找到它,对它作进一步的、更科学、更周密的调查研究,则使有关它的一切,仍然停留在 60 多年前,这就等于为“小河”之谜披上了一件神秘诱人的外衣。

首先,小河本身就是一个谜。

在贝格曼一行抵达时,小河总长 120 公里,丰水期在每年的 8—9 月,在那时,河里可以通行独木舟,是库姆河南南东走向的支流。那么,它就可以算是罗布荒原的一个极少见——如果不能说是唯一——的例外,在总体上为东西走向的水系中,出现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而如果说它是和古罗布泊(张骞、班超时期的罗布泊)同期的水域,那么它也是一个极少见的例外,因为在其两岸竟没有枯死的古老胡杨林带。在其他的古河两岸,这种枯立木和死红柳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装饰”。

除了“小河”的流向,这“奥尔得克的古墓群”自身的位置也相当特殊。贝格曼已经注意到,与其他的罗布泊墓地不同的是,在小河一带没有发现人类的古聚落遗址。贝格曼和他的探险队几乎踏遍小河流域,除了“奥尔得克的古墓群”(即 5 号墓地),还发现了其他几个墓葬和一座烽燧,但是却没找到楼兰人的村镇。这总是有一点不大对头的地方——5 号墓地的占有者们生前住在哪儿呢?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一般并不会把墓地设在族人活动范围之外。当然,贝格曼也指出,也许村镇的遗址已经被流沙淹没;也许他们的搜寻不够彻底,没辨认出早就高度风蚀了的废墟。但这毕竟有些不同寻常。从“奥尔得克的古墓群”附近的地势看,这个小山也似乎过于突兀,唯一的解释是,由于墓葬和地面建筑的存在,才使墓地没有被千年强风犁平,换句话说,当时的地面仅存墓地这一块了。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小河本身也就不可能在一两千年之后再次复活。

从没有发现丝绸等汉文化的遗迹这一点看来,“小河遗址”肯定更古老、更原始。但是,怎么能想象,怎么能相信,两三千年前古

楼兰国的普通人、最下层的居民，能够在自己的墓地建立起在当时来说是如此辉煌的地上建筑？就说那上百根巨木的柱子，成排の木栅栏和铺了一地的厚木板，哪个原始墓地有如此的“奢侈”？这正如贝格曼说的<sup>①</sup>：

没有人已经列举出哪一处墓地的外观像“奥尔得克的古墓群”这样，留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这样一片由高木杆和其他木纪念物组成的森林，到目前为止，它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也许，揭开楼兰土著文明之谜的钥匙已失落在“小河”流域，正等待我们去拾取。也许，已经被录制成密码的西域文明萌生史，就储存在这南北两条河屏护的秘境，要看有没有人能够破译解读了。

楼兰古史和罗布泊文明之谜留下了足够的驰骋想象的空间。不妨悬想：位于南北两条河——孔雀河（库姆河）和塔里木河——共同滋养的小河流域，是楼兰真正的土著居民的发祥之地，这两条河就是罗布泊文明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这里为族中的贵族上层修建了代表民族之根的陵墓，并以一条运河——“小河”——作为通向腹心根本之地的通衢之路。而在“小河”一岸的那个浑圆的土丘之下，真正的秘密还没有被揭开！如果想对弄清楼兰民族来龙去脉这个西域探险史的大难题作出反映，借助贝格曼的名著《新疆考古记》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 四

“小河遗址”和罗布泊考古是《新疆考古记》的核心，但并不是

---

<sup>①</sup> 见《罗布沙漠新发现的墓葬》。

它的全部内容。

除罗布泊地区,西北科学考查团还在天山南北的许多地方作过考古探险工作。但由于1927年和1933年两次进入新疆,都正赶上了发生特殊事件——杨增新被刺和盛马争霸,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使工作未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而比较成功的几次考察,比方袁复礼的北疆之行,霍涅尔、陈宗器的罗布泊探险,又都不以考古为主。但尽管如此,他们在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这次规模空前的探险考察,必将以艰苦卓绝的献身精神和丰硕的成果载入史册。

在《新疆考古记》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有有关且末古城(车尔臣的考纳沙尔)、瓦石峡古城、营盘地区、库鲁克塔格岩画等等的章节。

库鲁克塔格的岩画是新疆岩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迄今为止《新疆考古记》书中的这部分论述,仍是有关库鲁克塔格岩画的丰富、翔实的资料。贝格曼的成就和特点在于,他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包括解译铭文,类比图案,作创作意向的分析,就风格讨论它的年代等等,得出了这些幅岩画并非作于一时的结论,而且还就其作者的族属作了推测。当然,贝格曼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但他的下述结论恐怕很难推翻:即这系列岩画实际上是从史前到清朝中期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陆续完成的,岩壁高处的年代早;所以它们不是一族一时的作品。

现在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就是议论岩画已被人们随心所欲地“演义”了。这种说法或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但如果我们拿80年代以来拍摄的库鲁克塔格岩画,与《新疆考古记》中极为清晰的图版略作比较,就不难发现,从30年代到80年代,这里的岩画还在陆续增添着新的内容,那么怎么能设想古丝绸之路正当繁忙的相当长的年代里,它会一成不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库鲁克塔格山的岩壁看到的那些岩画,绝不可能都是——进而可以说绝大

部分都不是——某一个具体时期，比方 2000，或 3000 年前的作品。而贝格曼用自己的细致完整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可信的参照物。

在《新疆考古记》中，当结束了对“小河遗址”的描述时，贝格曼也没有忘记记下自己对罗布泊古今沧桑之变的感受。“5 号墓地——奥尔得克的古墓群”一节中，他这样写道：

如今塔里木河下游有大量的鱼，许多水禽也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肉食，此时正是采集鸟蛋的季节。也有大群野猪及羚羊。我们没有理由推测楼兰时期以来，当地动物的生活习性已经改变，换句话说，楼兰时代的动物群现在又随生命之水回到了沙漠。

同时，他还特意顺便考察了在复苏的库姆河下游和“小河”落下脚来的罗布人的生活实况。他发现，当地最宽敞的茅棚是属于塞特毛拉家的。在最近的 4 年间，这家人每年冬天住在塔里木河下游的老宅，夏天则来到小河，在这地角天涯过着“日出而做，日入而息”的“化外之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曾试着在小河种小麦，但没有成功；然而一个细致经营的家庭菜园的收获，则对改善生活不无小补。显然，这家罗布人想把他们在塔里木河绿洲学会的生计，返还给如今已成为荒漠的先民发轫之地。

贝格曼特别地记录了同事——中国学者陈宗器的一则目击分析。陈宗器发现，毛拉的妻子自己织一种黑白相间的粗毛布，毛拉一家所用的衣服、口袋、马鞍具等等，都出自这种粗毛布。而经过贝格曼的观察，“就质地而言”，这粗毛布竟在很大程度上近似于他们刚刚在“小河遗址”——“5 号墓地”出土的那种毛斗篷。相比之下，在 5 号墓地，这种粗毛布更“普及”，而且制作更精致。



看来,随着水的回归,生活又回到罗布荒原的每一个角落!这到底是观念的因循守旧,还是历史的进步?

自1934年至今,一个花甲的岁月过去了。那么,“小河遗址”是否还伫立在酷烈的风沙中,等候探险家前去探访;与“小河”相伴的罗布人和动植物种群处在怎样一个新的景况之中,又将由谁来告诉我们呢?

《新疆考古记》是记述几十年前的考古探险的一部旧著。它之所以引起了我这样大的兴趣,那是因为我相信,认真的读者一定能够超越书中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专业描写,把自己的关注和挚爱凝聚到西域探险以及开发大西北的举措上来。